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新模式支撑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郭春丽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形成更多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变化，顺应大国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紧迫性，全面系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奠定坚实基础。

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大循环仍存在卡点堵点，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因应形势变化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强调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既有利于我国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也是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这是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眼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持续不足，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从2025年的2.4%降至2026年的0.5%，大幅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外部需求收缩压力持续加大，给我国外贸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各国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竞争更趋激烈，大国博弈的复杂性进一步凸显。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因素影响，难以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巨大，能够形成更强的规模效应、范围经济效应与创新溢出效应，这是区别于依赖外需循环模式的中小经济体的核心特征，也是我们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坚实底气。通过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形成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以国内市场的稳定性对冲外需的不确定性，是我国增强经济抗外部冲击能力的战略选择。

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这一转变本质上是增长范式的系统性升级。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资本积累速度逐步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同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3万美元，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投资结构从投资于物为主向更多投资于人转变，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简单地扩大内需规模，而是顺应需求结构升级趋势，推动更多服务于人的投资和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提升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从而实现从依靠人口红利向依靠人才红利转变，形成“需求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这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前提基础。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是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顺畅衔接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是突出短板。内需不足会导致供给过剩、产能闲置，需要切实加以解决。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以需求为牵引，推动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精准适配，有利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一方面，国内需求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能够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供给侧的创新突破又能不断催生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内需增长空间，实现供需两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把握发展规律和内涵特质

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具有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并呈现出丰富的内涵特质。

内需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实现从依赖外需到内需主导的深刻转型。发达国家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经济增长依赖内需拉动的特征更加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大循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奇迹。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大国经济优势所在，内需已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13年至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93.1%。当然，内需和外需也并非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国内循环越顺畅就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同时对外开放在提升经济效率、转换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外需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要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相协调，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内需和外需良性互动。

消费拉动是大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方向。消费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内需最为关键的部分。观察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发现，消费率作为衡量消费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要指标，随着发展阶段变化呈现U型趋势。一国经济发展初期，消费率较高但属于生存型消费。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期，大规模投资往往阶段性抑制消费率增长，而待大规模建设完成后，消费率则重新步入上升通道。消费拉动型经济是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演进的共同方向，这一点在大国经济发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国际上，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时，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快速增强，而投资的拉动效应持续下降。比如，德国、日本分别于1979年、1981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最终消费率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拉动的重大变化。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正在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拉动，2013年至2024年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55%，高于同期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16.9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十四五”时期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60%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凸显。当然，消费和投资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是当期的需求和未来的供给，投资能否匹配消费，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需适应消费升级趋势，找准投资和消费的结合点，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内生增长是大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大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从来都不是依靠外部力量，而是依靠总供给体系和总需求体系在动态调整中不断适配、在相互作用中不断升级、在内外环境中不断平衡的内生动力。创新在推动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劳动投入增加、资本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发达经济体发展历程看，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驱动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而到了工业化后期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正在由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转向依靠技术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创新能力和平稳也在不断提升，2024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025年创新指数排名居全球第10位，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生增长注入了持久动力。

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发展活力

站在新起点，聚焦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既要统筹供给和需求、兼顾当前和长远、平衡投资和消费，还要创新政策手段方式、把握政策力度和节奏，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既注重资金投入，也注重投资环境建设，加快健全投资长效机制，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效益。一方面，着重优化投资结构。适应区域经济布局优化、人口结构和流动方向变化的需要，优化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基础教育、养老设施、住房保障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加大对消费新场景开发投资，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设施升级。另一方面，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进一步破除民间投资隐性壁垒，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打通堵点、难点、痛点，系统谋划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投资建设长效机制。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有关要求，扎实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稳定民营企业政策预期和发展信心。同时，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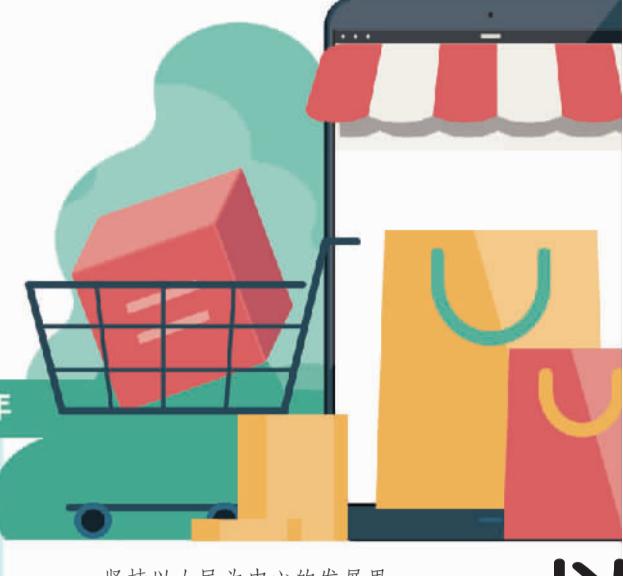


化政府投资结构，加强“硬投资”和“软建设”系统集成，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强化对政府投资决策的约束，加强全过程管理，提高政府投资效益。

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更好提振消费。加快完善“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政策环境，健全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全面激发城乡居民消费潜能。一是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二是持续消除消费后顾之忧。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教育、托育、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体系。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三是营造愿消费的环境。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创造良好消费环境。

坚持科技创新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改革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之举。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突出需求导向，强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全力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强化市在研发攻关方向、技术路线选择方面的引导作用，发挥政府创新组织者和生态营造者作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同时，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以此增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底蕴和实践要求，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智慧，在实践中更好推动民生保障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来源不同，但二者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彼此是内在融通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历史作用，深刻揭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鲜明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并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论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施政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主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警训，还是“富民为始”的治国之道，抑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整顿吏治、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的政策举措等，都彰显出古代先哲以敬民、安民、富民等为要旨的思想智慧。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实践观、发展观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产生“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文化形态。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期盼，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又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既继承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以新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又在辩证扬弃中汲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作出当代转化与创新表达。具体而言，在内涵上，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鲜明体现了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价值的有机统一。在地位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确立了人民历史进程主体、国家治理主体、价值利益主体、发展动力主体、监督评价主体的地位。在取向上，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实现党心和民心的“双向奔赴”。在途径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求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深化改革发展。在情怀上，强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用短短8个字简意赅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可以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底蕴既是历史的遗产，也是当代的富矿，背后蕴含着推动发展的精神力量和实践要求。

这要求发展要牢牢把握价值支点，统筹好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传统“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的治理智慧表明，发展与民生是紧密相连的。要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民生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将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的提升。通过健全的公共服务、公平的社会保障和持续的收入增长，筑牢社会稳定的根本基，进而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动态统一。

这要求聚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通过构建多层次、全周期的支持系统，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民生领域，既强化与民生相关的“物”的投资，又重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投资”，推动“物的现代化”更充分地赋能“物的现代化”，实现“物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要求锚定主攻方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镜鉴，深刻揭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在新时代实践中，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处理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效率与公平、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等方面的关系。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抓住教育、就业、医疗、养老、育儿等领域的痛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青年学人

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考量

陈小亮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明确要求，“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其中，“物价合理回升”首次与“经济稳定增长”并列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一新提法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

通过梳理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可以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物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2022年，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经济增长，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2023年至2024年，货币政策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增加了对物价的考量，要求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在此基础上，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鲜明地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既体现了宏观政策的一脉相承，也为科学把握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提供了重要指引。

锚定“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助于拓宽企业利润空间，为企业盈利和居民增收夯实基础。表面上看，物价低迷对消费者似乎是有利的，消费者可以用更少支出购买更多消

费品。但事实并非简单如此。从长期视角来看，物价持续低迷对消费者不仅不是有利的，反而是有害的。如果物价持续低迷，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企业之间竞争加剧，部分企业甚至退出市场。这既会降低居民从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也可能导致部分居民失去就业岗位。在此情形下，货币政策自然难以推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目标。

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能够有效缓解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可以提升企业投资动机，激励企业尤其是部分面临融资压力和债务压力的企业提升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居民消费意愿。由此，同样可以使货币政策更顺利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锚定“促进物价合理回升”，能够助力提振市场信心，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提供强劲内驱力。在“供强需弱”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企业继续加大对既有产品的投资，将可能加剧相关矛盾，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如果企业投资新产品，则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不仅如此，当企业本身债务负担较重时，物价低迷还会引发企业对未来实际债务负担和实际融资成本加重的预期，进一步削弱投资意愿。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着力推动物价水平尽快回到合理水

平，能够系统性地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企业家信心。企业部门的乐观预期将会带动居民收入预期向好，从而增强消费者信心。在良好预期的作用下，信心增强和需求扩大之间能够形成正向循环，为扭转“供强需弱”的局面注入动力。

在使用货币政策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重要问题。其一，要准确把握“合理”二字的深刻意蕴，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绝非要追求通货膨胀。关键要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稳妥推动物价回升到价格水平预期目标附近。其二，物价增速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增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包括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收入分配结构有待优化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只靠货币政策很难全面面对这些复杂成因。要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的协调配合，并强化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的统筹，消除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的结构性障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更好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重要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